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林岗 著

明清小说评点

Mingqing Xia
Pi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明清小说评点

林岗 著

Mingqng Xiaoshuo Pingdi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评点/林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1149 - 6

I . ①明… II . ①林… III . ①古典小说评论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3965 号

书 名：明清小说评点

著作责任者：林 岗 著

责任编辑：任 慧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21149 - 6/I · 250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2.75 印张 178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总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很难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人所淡忘。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21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丛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目 录

第一章 序论 (1)

继 16 世纪文人小说繁盛而出现的 17 世纪小说评点热潮；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概念；评点学批评体系的三层次命题；结构论、文理章法论和修辞论；索解之道：批评文本与小说文本的特殊关系

第二章 晚明背景下的文人文化 (13)

小说评点学是晚明文人文化的产物；晚明经济活跃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朝纲废弛与士人仕宦生涯的挫折感；士林讲学风尚所启发的个性气质与狂狷精神；晚明文人文化的独特性；事功失败转向文化创造；改编修订先前小说文本、弄笔评点、探求美术真谛、写作传奇、从事演艺、游历探险、埋头史学医学著述、潜心西来科技实证之学等构成的文人文化风景

第三章 评点学的渊源 (44)

唐宋以来诗文评精细化的倾向；古文经义教育与评点的出现；早期评点示例；明代科举养成的“诗文手眼”；八股文训练对评点家思想方法和眼光的影响；与科举训练有关的评点传统给小说评点提供了一个形式的框架

第四章 小说话语与评点学的文学自觉 (58)

史学话语笼罩下的小说话语；古人小说话语至晚明发生一大转换；晚明小说话语对传统小说话语的突破；李贽扫除文体偏见的思维理路的根源；金圣叹的事文分立观与他对文学普遍特性的阐述；汉魏六朝文论对文本特征的关注；评点学论文的大思路继承了汉魏六朝批评的正路；以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为标志的文论史上的第二次“文学自觉”

第五章 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 (96)

中西叙事观念对结构理解的分歧；古典长篇“缀段”讥评的偏见；奇书小说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的大结构原理；结构模式的美学特征；自然论哲学传统对叙事文结构美学观念的影响；因果论传统与自然论传统所导致的叙事差异

第六章 叙事文理的章法 (121)

故事单元的概念与叙事的特殊含义；意象、细节、人物和情节段落的反复迭现的运用；前铺“引文”后叙“余韵”的手法；对偶原理在叙事文中的活用；“正笔”与“闲笔”的交替穿插；古代叙事的观念：以“段”的空间化组织安排作为文理脉络的基本贯穿；叙事空间化的思想背景

第七章 语文学修辞的文笔意趣 (153)

中西小说叙事的修辞观的差异；评点家对奇书修辞的精辟眼光；谐音、双关、隐喻在细节中的特殊作用；反讽修辞与“曲笔”；白描传神的实质含义；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再思考

结语 深具文化意蕴的批评方式 (178)

论文批评的形式与批点批评的形式；五四以来对批点批评形式的偏见；传统的评点之学是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文学批评形式

附录 建立小说的形式批评框架

——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述评 (181)

再版后记 (197)

第一章

序 论

明朝自弘治(1488—1505)以后,由文人改编、修订、增删、整理、出版先前民间流传的平话、演义等所谓“稗官小说”的活动渐趋活跃,特别是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两朝,这种文学活动达到了历史上最繁荣的程度。文人对民间的原始素材、先行故事的加工修订,不同于今天由作者个人单独进行的文学创作。它一方面是修订者、整理者的个人努力,正是这些文学素养良好的文人参与修订、整理,才将故事提高到具有完整而自觉的艺术构思的水平;另一方面先前民间流传的底本也提供了充分的基础。这种在流传底本基础上修订、整理的文学活动是那个年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式。我们今天读到的明代最脍炙人口的几部作品,就是在这一阶段最终定形并以“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①《水浒传》的版本繁杂,根据明人的笔记资料,嘉靖年间已有包括一百零八条好汉全套故事的百回本流传。^②但嘉靖本现今只有残本传世,不能窥见全豹。现存的全本繁本《水浒传》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和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刻印的一百二十

^① “四大奇书”的写定年代,除《金瓶梅》、《西游记》较易确定外,至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学界多有不同意见。如以“写定本”作标准,我认为浦安迪的“16世纪”说是有相当道理的。故本文从浦说。见《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第1页。浦氏原文是:“Four of the most beloved wor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came into circulation in their most fully developed forms.”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7, p. 3.

^② 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李开先《一笑散》都提到过《水浒传》故事,李开先还特别提到该书有20册,刚好符合所知繁本长度。

回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三国演义》的版本流传情况更加复杂，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嘉靖本”，但现今留下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的一篇序文，写于弘治七年（1494）。“嘉靖本”之后，各种翻刻本不断问世，可谓争奇斗艳，层出不穷。《西游记》最早的刻本是万历二十年（1592）陈元之序的世德堂本，后天启、崇祯间又有叶昼托名李卓吾批评的足本《西游记》。《金瓶梅》最早刻本出现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为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后有崇祯绣像本。除了以上四种被清初及后来人称作明代“四大奇书”之外^①，还有冯梦龙改编、整理民间流传故事和仿话本体例创作的“三言”，以及凌蒙初创作的“二拍”。这两种书均出版于天启、崇祯年间。以上所提到的只不过是明代中晚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我们不是狭义地理解文学创作，此足以证明有明一代的中晚期是历史上“稗官小说”纷陈杂呈的繁荣时期。

“四大奇书”之中，除《西游记》、《金瓶梅》可定为嘉靖、万历间作品而无甚争议外，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现的年代，哪怕一个比较模糊的年代界定，在学术圈内远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一般把它们定为明初作品，更有的定为元末作品。^② 浦安迪主要根据现今这两部作品的版本流传情况，根据作品本身的体例和它们的长篇虚构叙事文的文学特征，而不是根据前人只言片语的记载或作者生平一鳞半爪的资料，将嘉靖、万历年间定为它们以“最成熟的面貌问世”的时间，即“写定本”问世的时间。^③ 也就是说，明代的中晚期代表了两部作品版本演化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品样貌就是那时文人修订、整理的结果。在确定“四大

^① “四大奇书”一说，最早见李渔为毛氏父子评点《三国志演义》作的序文。文曰：“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序文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见《李渔全集》第十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②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六编《元代文学》之第七章，简单陈述了他们所据的理由，认为把这两部作品“编入元代文学比较合理”。见该书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4页。

^③ 浦安迪整部书的分析都在证明他“16世纪文人小说”的论点。在他看来，根据目前的资料，从作者生平年代决定作品成书年代的思路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断定何时是版本演化史上最重要的时间。见《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的浦氏《序文》，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

“奇书”版本演化年代的基础上,浦安迪提出“16世纪文人小说”(*literati novel*)这一富有启发性的概念。他的核心看法可以综合如下: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小说文类,是一种文化界的产品而不是一种只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民间作品;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文人小说脱胎于通俗的民间故事、平话和说书,而在于强调明文人熔铸、改造民间传统,从中创造出崭新的散文小说文体。因此,这些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的思想抱负、美学趣味,其字里行间的遣词造句,字缝里的深远寓意,也要从文人惯用的技巧修辞手法获得解释。^① 浦安迪将“四大奇书”看成是严肃小说而不是通俗小说,这对本书将要讨论明清之际的评点学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事实上,浦安迪也坦率承认他关于文人小说的看法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小说评点家。评点家早已指明读者不可以将这些天地之间的“妙文”视作弹词、平话一类的东西。

是否将“四大奇书”和类似的作品称作“文人小说”恐怕仍有不同意见。但这些小说有相当浓厚的文人色彩和文人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书在浦安迪论点的基础上,将问题扩展到探讨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稗官小说的不时冒出和评点家对它们的持久兴趣在这里牵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知名和不知名的好事者修订、改编、整理那些先前不见经传稗史小说和后来评点家对这些新出现版本的热心评点,都属于明中晚期和明清之际文人文化的现象。事实上,那个时代是多少乖离正统的文人文化特别活跃的时期,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晚明文人文化。我们只有在这个视角下观察作品及其评点,才可能作出符合事实的解释。如果我们不是循文人文化现象而是循通俗文化的视角看待它们,就会有许多地方解释不通。例如,对小说表现出来的文人价值观和美学趣味的把握,评点家对小说本文释义作出的种种褒扬和贬斥,就不可能有通透的认知。

^① 参阅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浦安迪后来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加强了他早先的论点,似有否认“奇书文体”与弹词、平话等通俗文体的联系的倾向,而认为“奇书文体”远宗史传文与神话。我相当认同“文人小说”(*literati novel*)的看法,但文人之作与通俗文体存在某种联系并非不自然。浦氏后来的看法似有过当之处。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第二，随着完善版本的出现和流传，评点家继起对之评点，表现了他们对文人价值观和美学趣味的认同。笔者有理由相信，评点家所以评点作品，与我们今天以文学批评为职业的学院式风格有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他们不是站在职业的立场批评作品，而是站在文人的立场批评作品。评点家对文本的读解与文本本身价值观、美学趣味是一致的。这种对文本有深入认同基础上的批评，使得我们在远离古人的今天冀图重构评点家的批评体系，就必须紧密结合评点家当日所依赖的文本。本书的任务虽然只是探讨批评文本，但笔者深知其得当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作品文本的读解。因为两者所流露的世界观和趣味实在有太多的一致性，它们都是文人的产物。

小说评点大兴于明清两代，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本书标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意在把这个时期的评点学当做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而加以研究。继好事者修订、改编、撰写稗官小说，对这些文本的诸家评点也稍晚面世。现存最早而完整的小说评点当数容与堂本《水浒传》，后又有袁无涯刻本，由于两本都题李卓吾批评，孰真孰伪，至今仍未有一致的意见。^① 不过，究竟何本是李贽所批，抑或二本均非李贽评点，对我们探讨该时期的评点学并无重大影响。两本相较，一般认为容本评点比袁本更高明。^② 崇祯十四年（1641），金圣叹终于完成积十数年心血批点而成的贯华堂本《水浒传》，以《贯华堂第五才子书》的名目刻印刊行。金本问世，竟然光芒覆盖他本。有清近三百年，金本成为唯一的通行本。人只知有贯华堂本而不知有他本。入清后顺治十五年（1658），金圣叹又刊行他晚年呕心沥血之作《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即金本《西厢记》。金圣叹的这

^①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极辩容本为李卓吾评点。而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持论几乎与陈洪相反。他们认为，容本评点不会是李贽所作，而袁本评点较接近李贽的思想，至少是参照了李贽原批加工而成。章培恒新版容与堂本《水浒传》序亦断容本评点不是李贽所为。笔者亦以为容本评点非李贽所为近是。见陈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又见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1988年。章培恒：《容与堂本水浒传·序》，见《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② 容本优于袁本，学术界并无异议。

两种评点都可以说是明清评点的扛鼎之作。《三国演义》的评点本，现存有余象斗、叶昼伪托李卓吾、钟惺、毛纶和毛宗岗父子、李渔五家。诸本之中，李渔评本最晚出。^①而李渔没于康熙十八年，批点当完成于此前。毛氏父子批点《三国演义》约完成于康熙五年（1666）。^②毛氏父子评本的影响也如金本一样，此评一出，诸本尽废。张竹坡评《金瓶梅》本即《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于张所据的是崇祯绣像本，张评本一出，人几不知有词话本。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新捡得词话本，世人才知还有更早的刻本。除上述评点本之外，还有陈继儒批点《列国志传》、徐渭批点《隋唐演义》、钟惺批点《东西两汉全传》《封神演义》《夷坚志》、汤显祖批点《艳异编》《虞初志》、叶昼托名李卓吾批点《西游记》、冯梦龙批点《情史》《石点头》、剑啸阁批点《隋史遗文》等。明清之际，文人谈论他们对稗官小说见解的，除了评点还有一批序跋、笔记、散论等。以上提到的诸种评点文字，当然仅仅是勾画了明清之际评点圈子的大致轮廓。但从这个粗略的轮廓也足以看出，文人们批点那些圣贤不齿的稗官小说，确在那时蔚成风气。谓之批点热，恐怕不为过分。

从上述简单罗列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看法。第一，前所未有的对批点小说的热衷，是继诸种作品问世之后开始的。说明文人的兴趣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作品的感染。作品道出了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传达出他们的人生感叹，故有此批点，能够形成一时的风气。第二，评点小说的风气跨越晚明延至清初。这当然是晚明风气的延续，或者说清初的评点只是晚明的余绪。清初社会风气正在改变，士人如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等提倡经世致用，力纠明代的疏狂无学。加上清前中期康熙、雍正、乾隆均是勤政有为的君主，再配以防范、钳制的文化政策；人主风之于上，士大夫倡之于下，清代社会和士林中的这种新风气本不适合评

^① 据肖欣桥的《点校说明》，《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当成书于毛氏父子评本正式出版之后。“因为其中一部分眉批是照搬毛本夹批，有一部分眉批在毛批的基础上稍作增删或改写”。出处见《李渔全集》第十卷，第1页。

^② 此处从王先霈、周伟民两氏考订之说，见两氏著《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365页。

点学的生长。而清初仍然有水准相当不错的评点出现,这当然要追溯到晚明的风流余韵。评点大家之中,金圣叹和毛氏父子是由明入清的人,晚明的烙印自不待言。金圣叹纯粹是一个晚明文人,其思想、习惯、性格无一不显示出晚明特性。毛氏父子拘谨不少,思想性格与金圣叹亦有不同之处,但他们崇拜圣叹,并以金圣叹为师法榜样。只有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1670),与晚明无甚直接瓜葛,但其时去明未远影响仍在。至于晚明的风气对他造成的具体影响,我们今天虽然不能确知其细,但从他对《金瓶梅》文本读解之中,可以推测大略。由于批评的滞后,晚明评点热伸延至清初,这就是本文为什么称“明清之际评点学”的原因。但事实上评点的风气是晚明造成的,它的出现要从晚明社会背景中寻找因由,才能解释。而晚明的风流余韵一收结,评点即归于沉寂,亦无有水准的评点问世。脂砚斋庶几可以比肩,但他是属于知情者的批评,和金圣叹诸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要理解明清之际评点学就一定要理解晚明社会的特殊背景。正是由于它与晚明社会风气的特殊关系,本书将明清之际的评点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提出来,并把它同清初以后的评点区别开来。在本论以后各章,笔者会逐渐展开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这一概念,以求得对它清楚的认识。第三,诸种评点本流传至今,孰优孰劣,学者们已经得出基本一致的看法。金本《水浒传》和《西厢记》、毛氏父子本《三国演义》、张本《金瓶梅》与容与堂本《水浒传》是其中的翘楚。^① 笔者承袭这种认识,在探讨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时候,主要根据这几种评点本子而间及他本。对最优秀的这几种批评文本的读解,足以建立我们对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核心观念。

最主要的文人小说即“四大奇书”出现并流传于 16 世纪,而最有水

^① 元王实甫《西厢记》虽是曲本,但金圣叹并非从曲本的角度批评。金氏纯粹把它看成天地间一部妙文,其中与虚构叙述文道理相通的地方亦可以纳入讨论范围。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一书中,明言他对小说本文的释义,是取金本《水浒传》、毛氏父子本《三国演义》、张本《金瓶梅》的读解为首要解释框架。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将上述三本单列加以讨论。而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和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均单章论述金圣叹而并章论述毛氏父子与张竹坡。由此看来诸种评点本的优劣,学界无分歧意见,所存者见解深浅不同耳。

准和分量的小说评点则产生于 17 世纪。站在中国文论史的立场看,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在文学观念和理论方面的突破,不体现在传统的正宗文体——诗文而体现在其时尚属“文体卑下”的新兴文体——小说、传奇。有明一代在传统诗文理论的探幽发微方面,上不及宋元,下不逮有清,是一个比较呆板乏味的时期。无论明中期弘治至隆庆(1488—1572)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还是稍后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都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诗文理论的原创力,只晓得一味标榜高古,效古法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只表示他们诗文识见的鄙下。同期标举“唐宋八大家”的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谈文也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倒是他们对古文章法孜孜不倦的讲求和阐述,在间接的层面给后来的评点学积极的影响。明后期“竟陵派”钟惺、谭元春诸人,论诗求变更是走入鲁莽灭裂、刻剥古人的死胡同。论诗作文,只有明初宋濂、明中归有光稍有可取。晚明公安三袁“独标性灵,不拘格套”略有新鲜气象。与诗文理论的沉闷了无新意相反,嘉靖、万历以来不为流俗所拘有识有见的文人却在新兴的稗官小说、传奇等文体方面,开了一个前古未见的言说新天地。他们对业已成熟的叙事文体的独具只眼的精辟之见,他们对小说性质、功用、文体特征阐发和洞识,甚至对当时还为相当多的士大夫不屑一顾的稗官小说的兴趣,无疑表现了明代文论最有生气的一面,代表了明代文论最有创见的成就。当然,这里所谓文论的意思,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文章之论,而是文学理论的意思。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钟嵘、刘勰诸人论文谈艺辨别文体,厘定标准品评诗文,形成文论史上第一个对文学和文学性认识的高峰。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于现今文学意义的各种体裁还未完备。传奇戏曲还未产生,虽然

已有小说一词,但它并非具有一定故事长度的叙事文学的意思。^①而自小说、戏曲等新兴文体成熟以来,文人照旧品诗论文对此没有做出足够的批评反应,直到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大盛,这种批评的空缺才填补过来。评点家的“文学自觉”不是体现在正宗文体方面,而是体现在颇受正统文人歧视的新兴文体。正是存在这一文体批评的补充,古典文论史上对诸种文体的批评才显得完璧无缺。评点家在16世纪文人小说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大致完整的小说批评体系:他们一方面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与史传体文章区别开来,确立小说在文体学上的独立地位,这点颇相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辨”。^②另一方面,他们阐释了小说作为虚构叙事文的文本特性和小说家的各种叙事章法。这方面评点家的探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追寻虚构叙事文整体结构的美学观念,这是在宏观层次把握小说文本的艺术特性;发掘叙事章法的各种文理安排,这种探讨颇相似于诗文理论中对“法”的阐释讲求,属于对小说文本细部“肌理组织”的探幽发微;探求小说的语文修辞的笔墨意趣,修辞层次在小说艺术中虽属至微的方面,但评点家以为这是极重要的一环,他们的探讨创见甚多。笔者认为,这三个层次即结构论、文理论、修辞论的阐发构成了评点家关于“文”即小说的文本特性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作为一种古典的批评体系,体现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多侧面批评的风格,它既有对“文”的深入探求,又有对“事”的纵横议论。评点中因文而起随事而生的纵横议论也是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串着“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小说评点对“事”与“文”的相对侧重看似相互分离,而实质在古人“文心”的概念下是统一的。广义地说,小说评点学也是一种叙事理论,它一方面与现代叙事学的基本思想存在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点。

^① 小说一词最早见《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但这里“小说”只是“琐屑之言”的意思(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后又见于桓谭《新论》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但班固时代的“小说”亦非今天小说的意思,而是指街谈巷语、野史笔记、遗文逸趣之类。唐以后虚构故事意义的小说产生之后,“小说”一词似兼指野闻笔记和虚构故事两义。

^② “文笔之辨”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热点之一,通过辨别“文”与“笔”的差异,辨别“文”与其他体裁的不同,从而达到对文学本性和特征的新认识。参阅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萧统《文选·序》,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梁文》卷二〇。

它表现出强烈的叙事空间化的倾向。其别具一格的批评形式也是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

“文心”是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重要概念，它有二重基本含义：为文者之心（意图动机）；文本之心（即核心之心，指文本的文学特性）。而为文者之心又不仅仅与纯粹内心相关，在古人的思想里它是天地宇宙在人心中的见证。所以，“文心”又同天地之心、人文之心紧密相连。评点家自认的批评使命就是通过读解、评点小说重新体认、探究、阐发既至广至大又至隐至微的“文心”。文心浩茫，文心隐微，何处可见？一则见之于历代读者之心，而历代读者之心随生随灭，现已不复可寻；二则见之于评点家的批评文本，批评文本俱在而文心可觅。本论所作的研究就是对评点家阐发出来的“文心”作现代的读解。所谓现代的读解有三方面的含义：尽量客观地重构评点学即古人的批评体系；进而推究古人所应用的美学思想和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阐释评点学可能具有的现代意义。笔者虽然无可避免地使用今人的逻辑方法，但也期望此一逻辑框架能够清晰地勾画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轮廓，这项作于评点学产生三百余年之后今人的“复原”功夫，不免带有研究者本人的思维痕迹。但笔者也本着求真问学的初衷，小心读解，尽量避免穿凿附会，以求切近古人的本心。在读解古人的批评文本的时候，存在若干方法上的问题，需作解释。

古人的批评文本和它的文学文本存在异乎寻常的紧密关系。今人的批评由于采取西式的逻辑论述的框架，这种方式重在本身的逻辑自洽，批评文本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小说评点却连这种相对的独立性都没有，因为古人采取的批评形式使它就像是寄生在小说文本里面一样。“寄生”一词并不仅指评点在形式上附着于小说文本，它离不开小说文本，而且更重要的是批评文本的释义往往需要结合、参照小说文本才能语义完整，并获得理解。稍为离开小说文本而只从批评文本的字里行间去推究评点家的释义，很可能不得其解，或者随意附会。而对小说文本的理解，随着时代的远去，今人和古人可能相差很远。笔者在阅读古人评点时深感索解不易，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两种文本的特殊关系。今人对此点要有深入